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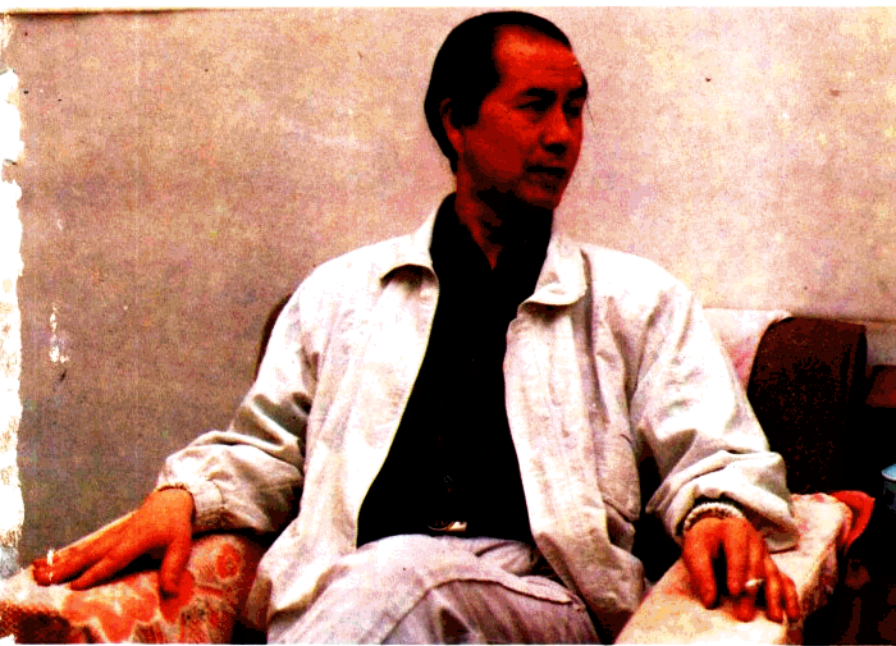
TAIBAI WENYI CHUBANSHE

太白文艺出版社

梦

文学禁

王鹏 著



作者近影

郑文华 摄

小 传

王鹏(笔名彭影)1939年9月生于陕北榆林市一个山沟小村,家道贫寒,解放后的1954年15周岁才进小学读书,1958年读完初中一年级参加工作。先后种过地,做过工,参加工作在地质队当山地工的学徒工,练习生,学习过地质专业做助理技术员,γ射线器操作员,五文化公司的物价员,当过人事干部,1965年又考入西北政法学院学过法律,经部队农场锻炼后分配在省委搞过多年宣传工作,发表过新闻、宣传报道、调查报告、评论多篇。王鹏同志单位变化较多,专业变换频繁,但他始终如一酷爱文学事业,热爱创作,从小写过快板、戏剧、相声,编导过许多农村文艺演唱节目。1965年入大学前创作了《一个妇女的遭遇》,约40万字的长篇小说,文革武斗中丧失。1976年后开始写评论,1985年开始创作。在工作之余先后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多篇,并继续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

人 生 的 路

——王鹏《文学梦》序

王仲生

《文学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书中讲的是作家王鹏在把少年时代的文学梦变为现实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继续这一人生之旅艰难跋涉的追求与信念。它显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阅读价值。不仅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即使是从事其它工作的一般读者，也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

《文学梦》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新时期以来，作为负责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王鹏根据当时所出现的问题，撰写的部分文学论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知识面，所阐释的文学观念，所昭明的原则态度与开放眼光，无疑标志了作者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上迄今达到的令人瞩目的水准。据我所知，与此同一时间作者还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在省内、外都曾引起不小的反响。也许，出于体例的考虑，关于创作部分，这本书是全部割舍了，我们只好在作者将来的作品专集中弥补这一审美的缺憾了。

二是作者的自传性文字，当初应省上一刊物之约而分期

刊载，洋洋洒洒近十万字，真实地记述了作者从陕北高原上走来，以初中生的程度，如何执著于文学的梦而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终于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成了一名大学生。是历史常常让人走错了门，还是人本来就无从选择历史？总之是，即使在极“左”思潮大肆淫威的重重灾难里，王鹏也不曾放弃文学。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置身于历史转型的时代变革，王鹏终于以有分量的文学理论论述及作品创作的双丰收，又一次确证了：人生不只是等待，更是一种奋进与超越。

这样的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以为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可是说是珠联璧合。

诚然，无论是论文，还是自传，它们都各有其价值，尽可独立成书。但把它们同时容纳在一本书里，就绝不只是 $1+1=2$ 的简单之和，而是产生了一种自成系统的整合效应。读了自传，你会明了，这些有感于文坛现状、倾向而发的针对性很强的文章与作者成长的文化、理论背景有着血肉的联系。反过来，只有自传，虽不乏感染力，但论文却将自传延伸与发展了，并且予以了升华，以切入现实、参与现实的理性思维之光将自传所呈现的那一片沃土，那一片沃土上的辛勤耕耘灿照得更为鲜亮而醒目。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为一种释文本的途径，我国历来重视把作者与作品联系起来，一并考察、审视。本书的构成与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如果不是不期而遇就是有意相承了。这样，这本书的意义就不仅仅只是个人身世的回顾与反思，不仅仅只是理论的建树，理论联系现实的力度与深广度，而尤其是从感性与理性的融和上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生范例，一个类似启示录的人生观照的对象。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谁不以自身为对象来研究人，谁就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人的深邃的知识。”人在这里当然是一个整体。我们只有把人从自身中分离，以之作为对象来进行考察与研究，才有可能获得关于“人”的深刻认识。在《文学梦》中，自传只是个案、例案，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每个读者都不难由此而真切了解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社会巨变以及个人命运在这巨变中的可能性与自主性。而文学论文，论的是文学。文学就其终极意义上追究，仍然是以对人的价值的探讨、人的价值的关怀为目的的。质言之，《文学梦》在普泛的意义上，是一本讨论、论证人生的书。

在作者看来，人生必须有所追求；而且，越是苦难，越是应该寻找对苦难的超越。越是时代为我们敞开了诸多选择的可能，越是要学会选择自己。这种追求、超越与选择绝不是一般欲望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价值意义的思考与实现。贫穷并不能扼杀童话。苦难将把童话培育得更加绚烂而多姿。就作者来说，走上文学之路，不只是一种爱好，一种痴迷，实实在在地，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的内在要求，一种既结合了个人的人生体验、人生感悟，又结合了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感的社會天职，这是第一。第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追求的漫长之路。它布满了荆棘与坎坷。它要求于我们的，除了执著的信念，坚韧的毅力，清醒的眼光，智慧的头脑之外，同时，还应具备有坚强的人格力量与巨大的心理承受力、爆发力。能够经受挫折与失败，能够走出诱惑与陷阱，更能够在机遇到来的时刻爆发出积蓄的能量，创造出迷人的业绩。

古往今来，“艰难玉成”，似乎已经成为一条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这在《文学梦》里，不是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了吗？

我以为，《文学梦》对于我们有如一个清醒的提示：不要放弃理想主义，不要放弃英雄主义，不要在横流的物欲面前忘掉精神的寻觅与探询，不要在苦难与不幸面前垂下你那颗高贵的头颅。这种理想主义，不再是虚妄的，而是蒸腾于你生活着的那块土地的。它是支撑你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并发现真实的自我的精神资源之所在。这种英雄主义，不再是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是张扬着你生命的全部活力，是你生命的走向自由与自觉的呼唤与实践。它将导引你在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命历程中不无悲壮地走向与历史、与时代的交汇。

作品一旦问世，就成了一个社会存在，不同的读者以各自的背景和阅读期待出发都会从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所理解的内涵，并且发出新的意蕴。请让我们同行，步入《文学梦》为我们展现的人生风景。

目 录

发扬“左联”的光荣传统 作家应牢记社会

责任	(1)
试论延安精神与鲁迅精神	(11)
从“大众艺术”到“金钱文学”	(21)
一篇值得人们深思的诗歌作品	(29)
青年作者要向老一辈作家学习	(35)
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	(47)
学习要靠刻苦奋斗	(53)
海南行	(78)
诉不完的哀思	(84)
一部光辉夺目的世纪史诗	(99)
文学梦	(104)

发扬“左联”的光荣传统 作家应牢记社会责任

今年是“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 60 周年。我们应当纪念和发扬“左联”为文学革命、为中国革命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形势下为文艺的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一、“左联”革命文学的传统 值得我们纪念和发扬

“左联”的出现，有它的国际历史背景和国内历史背景。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文坛上的强烈反映。从国际上看，1925 年联共中央对文学作出了决议，明确要求文学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成立全苏无产阶级的作家联盟和俄罗斯作家联盟（即“拉普”）。1930 年冬，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作家参加了会议。从国内来看，当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正是全国最黑暗的时期。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血

腥屠杀，许多热血青年对时局的危急而焦虑不安，寻求报效祖国的机会和救国救民之路。像鲁迅说的：“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苦闷，为了求光明的道路，各种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立了伟大的成功。”这正是“左联”的国内背景。

在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满足了革命文学青年们的人心所向。在1930年2月16日下午，在上海的鲁迅、夏衍、冯雪峰、郑伯奇、柔石、洪灵菲、阳翰笙、彭康等12人先集会研究成立“左联”的事宜。经过两周的紧张筹备工作，于3月2日成立了“左联”。当时，参加大会的有40多人，参加的作家有50余人。大家推举出鲁迅、夏衍、钱杏邨三人为主席团，冯乃超报告了筹备经过，郑伯奇为提交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作了说明。发表演说的是鲁迅、田汉、阳翰笙。大家从各方面的代表中推选出七位常务委员，照顾到了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南国社等各个团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团结合作精神，这在当时，确是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

“左联”成立后，把广大的进步作家较好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针对当时文坛的机关杂志《礼拜六》宣扬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和“鸳鸯蝴蝶派”的徐振亚、吴双热，周瘦鹃等以及“第三种文学”展开了进攻，向旧世界、旧文坛宣战，揭露反动黑暗势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批判资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时引导了当时进步文艺的健康发展；提倡文艺的大众化和文艺同工农的结合，并且专门开会几次进行讨论，针对“文艺至上”、“第三种文学”、“文艺自由”等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了适合当

时工农群众接受的通俗文艺、大众文学；十分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积极发展进步文艺创作。这些都是“左联”所做出的贡献。

二、反思文学改革的现实 应当恢复作家的良知

“左联”的文学革命，至今已过了60年。然而，“左联”所痛斥过的东西至今还在死灰复燃，使我们在文坛上仍然进行着30年代的斗争。这斗争，仍然没有离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的内容。去年发生的一场动乱、反革命暴乱，使一些从来不重视，认识不到的人们认识到了，或者基本上认识了。反思这几年的文艺，我认为：

第一，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党对文艺的领导，过度地强调了“不干与”政策。对近几年生产、发表的作品，让读者、观众自己评论去、结论去，致使一批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作品得以危害社会，特别是毒害青少年。我们对文艺的领导是不是失控？许多人不承认，然而有些人是承认的。1988年春，我在北京一个宾馆住着，同房里还住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当我们相互认识以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老实告诉你，现在全国的主要文艺阵地（期刊）在我们手里，而不在你们共产党手里，就叫贺敬之、林默涵也毫无办法。”所以，我们国家所执行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一个躯壳，正如一些群众说的：“坚持社会主义没方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抽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没力量。”我在我省干阳蹲点，有个农民说：“现在的人肚子饱了，脑子空了，心瞎了！”像这么一种状况，直到反革命暴乱之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在人

们的思想上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纠正起来自然已不很容易。

第二，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不够端正。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相当一部分出版物、电影、录像制品以及一些期刊、报纸，滑到了宣传自由化观点、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打斗、色情淫秽方面去了。从我管的工作看：1986年前，我们收缴销毁化浆小报书刊有800多个品种，1200多万册（张）；1987年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中，查处销毁书刊230多个品种，960多万册（张）；1988—1989年“扫黄”之前，查处销毁书刊120多个品种，20多万册（张）；去年的“扫黄”以来，化浆销毁书刊240多个品种，30多万册（张）。编辑印发《查禁书刊目录》五册，近千个品种，音像查禁目录近400多个品种。然而，我们销毁的这些书刊及音像制品，只不过是传播到社会上去的微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还在读者手中，特别是在青少年手里，在中小甚至在一部分大学生们的宿舍里、书包里和家里。这些腐朽的东西，继续在毒害着青少年，腐蚀着干部职工，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诱发犯罪中起着恶劣的作用。

第三，忽视了文艺作品对人们的“直观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古今中外有良知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都承认作品对社会人们所发生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都是人们所公认的。当然，对于一个成熟的人，不良影响不易影响他。但对于未成年人，对于涉世未深的人，特别是由于10年动乱而缺少了教养的人，对于10年中未进行过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的人，或者没有经过马列主义基本训练的人，甚至没有经过人格的基本训练的人，不良的东西对他们的毒害是很容易的。由于他们世界观未形成，好奇心强，有一种极大的模仿性。从而受到诱惑，染上恶习，走上邪路。法国法律心理学家古曾在

分析青年心理特点时说，有具体作家和犯罪内容的电影，其“目的虽然表示犯罪是犯不着的，并且犯罪人终究得到报应，但是这个暗示在青年的心中不生作用，所保持的暗示是犯罪本身的动作和犯罪的行为之想象的魔力”。由于这种“魔力”的作用，使一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道路。我们公安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中由于受这种影响而犯罪的占80%以上。据公安部最近统计，也占50%以上。同时，我们的文艺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背叛了马列主义文艺观，在文艺的性质，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上，如现实主义与现代化，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我的问题上，在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源泉，作家的世界观与文艺创作问题上以及文艺的民族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论与歧议，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第四，宣扬了寻欢作乐的思想，抛弃了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的光荣传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把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一代人引向了邪路。我在一个中篇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什么艰苦奋斗的干打垒是造神运动的开始，是‘凡是’派的高调；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苦行哲学、不懂得现代化享受；什么‘愚公移山’是不重视科学知识，是对知识分子的否定；什么个人主义是走向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动力和基础；什么男女接吻有利于双方身体健康，男人的精液可以治疗多种妇女病；什么人类的婚姻要向婚外婚、换婚、合同婚、试婚的方向发展；什么人类由动物性到人性、由不穿衣服到穿衣服，还要发展到不穿衣服。时髦一时的这些‘科学’报道，塑造了相当一批年轻人甚至一代人。程程和莲莲十分欣赏这‘现代意识’、‘现代观念’。他们经常向把他们当作唯一生存希望的母亲说：‘50年代人帮人——最傻；60年代人吃人——最馋；70年代人批人——最凶；80年代各人顾各人——最好。’”这是小说里描写的一个

曾为高中优等生，后随母亲进城堕落被判长刑的姑娘说的话。可见，我们的一些作家像雨果痛斥过那样，他们把病态社会“最平淡无奇以至难以忍受的书、最愚蠢无知以至背神叛道的书、最违反人伦以至淫邪无耻的书”都供给这一代人，使他们“贪婪地吞噬了下去，这个社会败坏的口味和已经麻木的机能拒绝美味或有益于健康的食品”。这些拙劣的或猥亵的所谓作家、出版家、影视摄制家、表演艺术家、歌唱家们“今天已经堕落到乞讨仆役们的掌声和荡妇的微笑的地步了”（《论文学》）。作家孙犁说：如果这些人也算作家的话，旧社会倚栏接客的妓女们也应该算作家。

第五，文艺仿社科方面“精英”们的奇谈怪论，引导人们脱离现实，追求所谓自我完善，个人享受。前些年，清理精神污染时，有些人提出：为什么见之于社科方面的观点允许，见之于文艺就是污染呢？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精神污染之后，文艺非但紧跟上去，而且将那些时髦的理论见之于各种形式的文艺领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歪曲了文艺作品等出版物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腐蚀了一批作者、歌唱者、表演者。有的作者专写性病、性知识、性开放一类内容的所谓“通俗文学”，实为低俗文学。他们一篇两三万字的作品可向不法书商们收到近万元的卖文费，而且可同时卖给五六家期刊、出版社出版（发表），四五万元不光彩的收入就拿到了。有位美术工作者出外卖画赚钱，赚名气不大，赚钱太少，找到我省一位有名的画家，要求利用其名合股分成遭到了拒绝。有的大学教授也不甘于讲台上的工资，钻营在不法书商中，从事非法经营牟取暴利数十万元。类似这样的人，在我省为数不少，不必说那些靠喊《换大米》躁音的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走穴者”了。

然而，这种文学艺术的贬值，文人人格的贬值的状况，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而被一些外国人意识到了。早在1981年，荷兰著名国际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看了我们一些新片后规劝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电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希望中国不要这样做。”美籍华人电影导演唐中璇针对我们一些影片说：“电影吸收外国的东西，也应该保留我们民族的传统，保持我们民族自己高尚的情操”。当我们的电影出现这种倾向时，一位外国电影导演结论性地说：“看来中国电影已经急转直下，将在方向上发生根本的转变。”我曾经陪同一些外国人看我们的文艺演出，节目一开始就有许多人要离开剧场，我问为什么不想看，他们说：我们来中国想看你们民族的东西，如果看“芭蕾”的话，我们看“老猫子”的好了。当许多人要走时，其中一位却很感兴趣地在拍照演员们的表演，我问他为什么感兴趣？那人回答：我是喜欢女演员的大腿！

三、充分认识文艺作品的作用 作家应牢记社会责任

要充分认识文艺作品的积极作用，也应看到它的消极作用，尤其是它的“直观影响”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当然，对这个问题文艺界是有争论的。像梁启超把小说说成兴万物的万应膏，我们谁也不赞成，但我还在少年起就崇拜的一些文学名家完全不承认作品重要作用，甚至以一个作家住房面积小为由，不承认作品的重要作用，我也不赞成。

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是承认的。高尔基针对剧本创作说：“一个严肃的作家的任务，是要用具有艺术说服力的形象来编写剧本，努力达到那种使观众深受感动并能改造观点的

‘艺术真实’。”（《论剧本》）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给现实拍照，他或是肯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坏现实。”（《论文学》）谢德林认为，文学所创造的典型给社会打上烙印“在这些新的典型的影响下，一个现代人就能不易觉察地养成新的性格，一句话，能逐渐地把自己培养成新人。”季米特洛夫认为影响了他自己“性格的原因”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此外，伏尼契的《牛虻》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奥列格·柯歌沃依的影响，《把一切献给党》、《红岩》等对我国五六十年代青年的影响等，都说明文学艺术对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样，作品的消极作用更不能低估，特别是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凶杀、色情淫秽以及描写犯罪的作品，尤其是这类影视作品，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更是很大的。无论是对人健康的成长还是诱人堕落，都是不能低估的。艺术离开了对人们思想、性格、品质的影响和社会作用，就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它将“成为清闲享乐的东西，游手好闲的懒人的工具”。鲁迅还在早期时候，就认为文艺作品不应该是消遣的东西，他号召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自己就以《狂人日记》揭露在“仁义道德”的掩盖下来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吃人本质，号召人们起来“救救孩子”，清算四千年来的旧账，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强调文艺要为现实服务，“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痛斥那些把小说视为“闲书”的论调，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态度。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消闲”的新式别号。至于后期的鲁迅，已经公开宣布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也是30年代左翼作家的文艺观、政治观。由此可见，我们这些年来

文艺方面的争论还没有脱离“左联”时期作家们的斗争内容。

我不赞成存在什么专门供人们“消遣的文学艺术”。我认为，文艺可以改造人，养成好的品质，也可以使人染上不良习气，直至堕落（尽管有人不承认这类东西也算文学），文学最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因而是文化教育最强有力的手段。高尔基说：“文学也是影响人的理性和意志”有力的工具，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尽管今天唱“通俗歌曲”，读“通俗文学”，跳迪斯科的青年中一些人取其糟粕，弃其精华，但它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恐怕中外文坛许多人是公认的。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高度赞扬狄更斯等“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02页）。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52页）。

鲁迅在谈到小品文的作用时，强调要作投枪、匕首。他说，小品文“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